

武昌縣文史資料

第三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昌县委员会

文史資料究研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

张体学同志在五里界

汤 立 规

体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5年了。

提起体学同志，人们对他那种艰苦朴素的生活方式、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都是有口皆碑，念念不忘。本文仅就体学同志1970年冬至1973年春在武昌县五里界蹲点期间一些情况作简要的记述，藉以纪念体学同志。

(一)

1970年冬天，体学同志来五里界蹲点。从这以后，他经常来来去去，但总是轻车简从。他不喜欢迎进送出，特别是厌恶象宴请宾客一样的招待。一次区政府为他准备了九个菜就餐，他非常生气，批评区领导：“你们机关没有经常这样吃吧？我来就这样搞，干部怎么想？这桌菜既然是为我张体学办的，钱就该我出。”并对在场的同志说：“吃吃喝喝最脱离群众。这种事我们不能做。以后白菜、豆腐一锅煮，盛在一个钵子里，谁来了都一样。”

有一次张体学同志到锦锈大队郭家坡去，该队党支部书记曹华清顺便请他到家里吃饭，体学同志欣然应允。但华清同志事先没有准备，打算上五里界镇上买点菜，体学同志坚决不同意。华清同志说：“没有菜，怎么吃饭？”体学同志问，“你家有白菜没有？”华清同志说：“有。”他又问：“有腌菜没有？”华清同志回答说“有，而且还可以笨个鸡蛋呢。”体学同志说：“这就蛮不错嘛！何必再花钱呢？”吃饭时，体学同志点着桌上的菜对

跟随的同志说：“一碗白菜，一碗咸豆角，一碗腐乳，一碗腌菜，一碗蒸鸡蛋，一共五个菜，这在农村就不错了。我们过去打游击，哪能吃到这么好的饭、菜？”体学同志的话，使同志们深受感动。

又一年春上，为解决农业机械问题，区委领导派曹华清到省里找体学同志。华清顺便带了两条鲢鱼和两斤猪油，来到省委门口，当警卫人员盘问时，体学同志从办公室的窗口看到了，立即大声告诉门卫说：“这是我请来的农村客人？”华清来到办公室，体学同志非常高兴，热情地同他握手，问长问短。中午，体学同志带他回家吃饭，并请副省长夏世厚作陪。吃饭时，体学同志对夫人林少南说：“跟华清同志拿个大碗来，农村的同志干活出力气，饭量大些。”临别前，华清奉上鲢鱼和猪油，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体学同志说：“你这是干什么？心意我领了，礼可不能收？”夏副省长打圆场说：“华清同志远道而来，一点小意思，算不得什么礼物，收下算了。”体学同志坚持说：“鱼是他在市场上买的，猪油是他到食品称的，要么给钱，要么怎么拿来就怎么拿回去。”最后，还是按市场价格付了钱。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反映了体学同志为政廉洁的作风和一尘不染的高尚品德。

体学同志还常常在会议当中，工作之余，用他密切联系群众的体会教育干部。有一天他说：“你们到群众家里去做工作，人家端茶给你，不管是用杯子，是碗，还是钵子，不管里面是茶叶，还是花红叶子，你端到就喝；人家叫你坐，不管是椅子，还是凳子，不管是干净，还是脏，你就一屁股坐上。这样你就与群众打成一片了，群众就把你当成自己人了，他有心里话就会跟你说了。”体学同志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通过言传身教，使人倍感亲切，深受教育。

(二)

体学同志每次来，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布置下面做这做那，而是到下面去走村串户，倾听群众呼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有一次，体学同志来到郭家坡，视察生产队集体养猪情况后，又向饲养员祁树生询问了私人养猪情况。老祁说：“私人吃的口粮只那多，养猪没有饲料，另外，私人养猪又吃不到肉，养猪积极性不高。要是解决饲料和吃肉问题，私人养猪就会多起来。”体学同志听后，连连点头说：“对、对。”当时就征求同来的省、地、县领导同志的意见，决定以后卖猪回粮、回肉。即一百斤毛重回五十斤饲料粮，一百斤净肉回三十肉。实行这个政策，对当时牲猪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随后，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群众的收入、生活等方面的情况，他又亲自到锦绣五队大塘村调查，并在贫雇组长王广年家里召开座谈会。与会群众一致反映粮食不够吃。体学同志问：“每人一年留多少？”大家说：“360至600斤不等，最多只能吃600斤。”体学又问：“为什么不多留一点呢？”有人回答说：“上级叫一超再超，粮都卖光了。”体学同志对身边的大队贫协主任张千甫说：“老张，你说老实话，到底留多少为好？”千甫回答说：“最少人平600斤，劳力要得800斤。少了吃不饱，做活有得劲。”体学同志觉得有道理，就和有关领导商量，指出什么事情都要讲实事求是。光要群众卖粮，吃不饱肚子，怎么产粮。决定各生产队、大队和公社都留一些机动粮。从此，社队都留机动粮并在全省推行。

要彻底解决吃饭、养猪等问题，关键是发展农业生产、提高产量。体学同志认为，五里界的农业基本上处于广种薄收状态，其主要原因是岗坡地多，晴不保墒，雨不保土，地力很薄。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体学同志亲自到中洲大队搞岗坡地平整。一个月时间，他到工地四次，同干部群众一起劳动，谈心。一次工休时，体学同志问大队党支部书记叶宗树：“岗坡地平整后种什么？”叶宗树说：“种水稻。”体学同志摇头说：“不对，平整的目的是为了‘三保’（墙、水、土）提高地力，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这就叫因地制宜嘛！”体学同志为了用事实教育说服群众，认识平整土地的好处，在中洲大队响塘叶村旁边选了三块最差的五亩地种小麦和油菜，亲自试验。第二年小麦亩产360斤，油菜亩产430斤，获得良好收成。体学同志的示范作用，进一步推动了五里界平整岗坡地的工作。当年全区平整岗坡地达二千多亩。体学同志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身体力行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三）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也是每个党员行动的准则。体学同志在五里界蹲点的一言一行，充分体现出这一点。他不是空讲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喊叫别人去为人民服务，而是身体力行，亲自为人民办实事，让人民得到好处。

体学同志到五里界蹲点，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春节前后各村做好八件事，即做猪栏、修牛舍、盖厕所、挖粪库、打水井、植树造林，……，目的在于改变自然环境，改善人民生活。体学同志曾风趣地对五里界的同志说：“你们原来的吴书记（吴才生同志）为什么长得胖，就是因为天天吃塘（糖）水，喝田（甜）水长胖的。”从此，各个湾村的自然环境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基本结束了“吃塘水、喝田水”的历史。

鉴于五里界岗坡地多，劳力少，体学同志主张把那些死岗坡地栽杉植桐，发展多种经营。他还亲自向群众宣传植树造林的好

处：一年栽树，十年成材，家有千棵树，子孙后代不受穷。并从省里带来十棵树苗，亲自栽四株在区礼堂后门口，栽六株在曹华清同志门前。在体学同志宣传、鼓动和示范下，五里界区从1972年冬开始，连续几个冬春都掀起了植树造林运动，队队办起了林场，成片成片的黄土坡地披上了绿装。现在年年受益的杉树林，都是那些年间营造的。锦绣大队先后造林1400亩，其中杉树800亩，柑桔90亩，茶叶60亩，楠竹80亩，油橄榄20亩。这些用材林和经济林，不仅满足了今天人们生产和生活所需，而且成了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群众和干部常常深情地说：“我们现在用的是体学同志的树，乘的是体学同志的凉！”

“靠提水，撞到鬼，卖的钱，抽了水。”这是五里界群众对抽水抗旱成本高、效率低的抱怨。体学同志体察民情，为民排忧解难。他向区领导建议兴修水库，扩大自流灌溉面积，降低抗旱成本。体学同志对每件事都是“言必行、行必果。”他亲自到幸福大队的锅炉山察看地形，研究设计，修建幸福水库。由于这座水库占压水田面积比较大，还要搬迁一个湾村，上至有的领导，下至少数群众，思想有些不通。体学同志便跟群众算得失帐，描绘水库综合利用远景，说服群众，请地、县领导到现场开会讨论，做到认识统一。在体学同志的精心组织下，一座五里界蓄水最大（四百多万方）的水库终于建成了，使4000多亩水田得到自流灌溉，遇旱不抽一滴水，年年夺丰收。

最使人难忘的是1973年，体学同志身患重病，还念念不忘五里界人民，不忘幸福水库的建设。记得是三月的一天，体学同志来察看幸福水库，因雨后初晴，道路难走，他下车步行到水库大坝上，虽然满头大汗，气喘嘘嘘，但浮肿的脸上，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指着水库起土收方的一道道上埂子，对陪同的几位党委说：“这些东西要推平，还有两棵树也要拔掉，不然以后养鱼用网就不好办。”又说：“水库要综合利用，库内要养鱼，库

旁翠植树，还要养猪，做到鱼、林、猪配套发展，互相促进。”
说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陪去的同志们一直把体学同志送上

还久久不愿离去，头脑里回响着体学同志说话的声音，眼睛盯着体学同志留下的脚印，思绪万千，不能平静。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体学同志最后一次来到五里界，也是五里界人民最后一次与体学同志分别！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体学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优良作风和崇高品德，将永远留在武昌县五里界人民心中！

（根据五里界调查组张用武提供的材料写成）

1988年12月17日

武昌县人民政府成立经过

金 锋

今年是武昌县解放39周年。值此之际，将新生的人民政权——武昌县人民政府成立经过，略加叙述，以示纪念。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奉党中央、毛主席之命，挥师南下，直逼华中重镇——武汉。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于5月15日乘飞机仓惶南逃，张轸部队在金口正式宣布起义，湖北省基本解放。5月20日，省人民政府在孝感花园镇成立。

5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组成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武汉三镇。同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月底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由主席邓子恢和副主席吴芝圃、李一清等从河南省开封市迁移武汉市。

6月1日，由党中央组建的南下干部“河北省冀南支队第五大队第三中队”和“豫西江南支队湖北大队第五中队”会师于中共湖北省委驻地黄陂县城，听候分工。5日，中共大冶地委、行政专员公署于武昌徐家棚火车站，具体分配南下干部，到各县、区工作。

6月7日，组成中共武昌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班子，由县长李仲伯带领梁国栋、张文斌、李宣化、姜云龙、曹荫录等具体负责接收国民党武昌县政府工作。

先后接收国民党县参议会、县政府、警察局、党政军联席会、干训所、兵役协会、情报组、保警队、防空哨、田赋处、税捐分处、县立中学、简易师范、体育场、卫生院等有关部门以及原县所管辖21个乡镇264个保。总计有职员225人，役员236人。

参加移交人员有国民党县长李锡璋、秘书彭少悟、民政科长李明、民政科长王槐幼、建设科长朱增辉、教育科长陈家鼎、田赋处长祝敏鑫等300余人。（武汉系和平解放，旧职人员全部未走）

根据党的政策，对原有财产、物品，一律登记造册移交，不得隐瞒私分；所有旧职人员全部适当安排工作，不愿干者由政府发给路费回家。这样就有李明皋、朱增辉、朱树森、沈楚益等20余人由政府安排了工作，有的一直工作到现在。

6月10日，中共武昌县委会、武昌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办公地址设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63号（旧县政府内）；各区人民政府亦于同日成立。县、区人民政府成立时，均出布告，宣示于众。

县委机构设立了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总计人员14人。当时全县有中共党员106人（正式99人，候补7人）。

县人民政府设立了秘书室、民政科、财粮科、建设科、教育科、工商科、公安局、税务局、人民银行等机构，合计人员49人。

县辖七个区，即一区（纸坊）、二区（青山）、三区（豹子潭）、四区（五里界）、五区（金口）、六区（马鞍山）、七区（山坡），将国民党县政府原辖21个乡镇和1个特编保，划归7个区管辖。区工作、勤杂人员共计152人。

6月12日，中共武昌县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与会县委成员有政委苏韦、副政委马毅、县长李仲伯、组织部长王克天、宣传部长曹荷光。会上，讨论了大冶行政专员公署限月底完成征粮任务450万斤的具体办法。13日，县召开了第一次区政委、区长联席会议，落实了征粮任务。

6月19日，县人民政府在写给大冶行政专员公署的报告中说：“我县接收伪政府之各种政治、经济机构，因伪政府疏散，大多只能据现有残余不齐的一点作了简单的接收，许多材料和物资还有待不断清查。”接收工作至此告一段落。

鄂南剿匪话当年

万学海口述

五十年代第一春，除西藏外全国基本解放，再也没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了，但有些省、县的局部偏僻地区，还有国民党的残匪活动，因此还有剿匪的军事任务。在鄂南山区，就有白崇禧的第七军主力南撤后留下的残部和原属张轸十九兵团而不愿起义的散兵游勇，他们与当地土匪和地主武装相勾结，流窜于崇阳、通山、通城一带深山老林，间或混迹农村集镇，也有的盘踞山头做据点。他们和地主恶霸相依为命，狼狈为奸，四处打家劫舍，搜刮民脂民膏，骚扰老百姓，奸淫妇女。所到之处，群众难于发动，革命政权不容易建立起来。这帮残匪也很狡猾，白天穿便服，成群结队打着红旗喊着“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的口号，却把枪枝藏在民房的夹墙间、地窖里或阴沟中，夜晚穿上“国军”制服，明目张胆地向群众征粮派款。因此，肃清残余匪军，建立革命政权，便成了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1950年10月，我们金口区区分队队员300人，在队长袁登贵带领下，与纸坊、流芳、豹澥以及鄂城的葛店、华容等十几个区分队，集中到葛店木破港整编，组建成大冶军分区地方新兵团，共有人枪1300多。团长姓黄，小名和尚，是攻打太原城有名的战斗英雄。大冶军分区的司令员是张体学同志。当时军分区的首要任务是剿灭残匪，维护地方治安。我们先沿武昌、鄂城、大冶的长江边一带剿匪，进展相当顺利。到1951年春，我们新兵团开到了梁子湖畔的金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军即四野所辖的636团（该团主力已经南下，准备解放海南岛，剩下的仅是留守人员，因

此我们补充到了该团)继续剿匪。部队由金牛向西南方向挺进,长驱200余里,到达了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大山区。这里有一座不知名的大山,山上有一座很有名气的大庙,名叫皇觉寺,相传明朝的开国皇帝朱洪武早年贫困潦倒,曾在寺里当过和尚。山上盘踞3000多敌军,枪炮齐全,装备精良。这里山峰高,山坡陡,山路崎岖,易守难攻。当我们紧缩包围圈后,敌人就居高临下,据险顽抗。这些敌人野心勃勃,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江北有麻城、罗田、黄梅等县残匪遥相策应,江南云、桂边境有李弥残部北窥回窜,一俟时机成熟,可以来个南北夹击,中心开花,一举吃掉我大冶军分区,然后再向大别山区发展,配合国民党“反攻大陆”。

我们初进山区,老百姓是用疑惧的眼光看待我们,我们解决给养利用原有的保甲长挨户征粮,老乡们只用小升子零星丁点地应付一下,以致使我们有时还能勉强吃上两顿,有时只能吃一餐。我们任命的村长和农会主席,往往被地主恶霸通风报信给白匪军杀掉了。战士们分散住宿在老百姓家里,常常遭到土匪暗杀。后来我们白天伪装在这家搭铺留宿,天黑以后,出其不意,临时转移,才能安全过夜。为了改变被动局面,我们从贫雇农中培养土改根子进行土改,并建立民兵组织。当民兵们戴上红袖章,扛起长枪,并分到了地主的五大财产之后,他们就和我们一起心连心了,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巩固农村阵地,他们不分昼夜值勤放哨,替我们摸匪情、查坏人、监视地主恶霸的活动,成了我们清匪反霸的得力助手。

1951年4月,我636团联络地方各县、区分队与民兵连队共5000多人,向山上发起攻击,打了三天三夜攻不上去,后调来炮兵,拖来了92步兵炮、90野炮与山炮共40多门,打了几千发炮弹,直打得山摇地动,敌人抬不起头,站不住脚。把山腰的守敌打垮了,再攻山顶。敌人打我们,火力是分散的,而我们打敌人,火力是集中的。又

打了一天一夜，山上寺庙中弹着火燃烧起来了，敌人损失了一大半。我们乘胜往上冲，占领了山顶，活捉了36人，其中有一个化装成长老和尚的是敌人头目赵矮子。我们把这些人都带到金牛逐一审问，个别属于好人或是胁从分子，就地释放，剩下的包括有连排级军官在内，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顽固分子33人，押到金牛桥头镇压了。

这次剿匪战斗，我军共缴获轻重机枪100多挺，60炮50多门，还有大批步枪、手榴弹、排铳等武器。其中大刀、鬼头刀足有3000多把。真可谓战果辉煌。

部队凯旋驻地，老百姓得知我们端掉匪窝，肃清了匪患，都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出来迎接，他们打从心里热爱人民子弟兵，并涌现出了送子参军的动人场面。例如有一家寡妇，两个儿子，母亲硬是都要送到部队，经再三说服，才同意把大儿子留在身边，帮助生产支援前线，小儿子当上了光荣的人民解放军。

每当部队早晚集合唱起革命歌曲时，老乡们都来围观。当我们唱起了“同志们呀，不要忘本，参加了解放军是为了人民……”以及“国民党啦，那个一团糟呀，……”的歌曲时，老百姓从歌词内容联系亲身经历，深刻体会到新旧社会是两重天，共产党同国民党有本质区别。当听到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群众都非常感动。我军秋毫无犯，军纪严明，赢得了群众的赞扬和拥护。后来，他们主动拿出大斛桶、大箩筐的米粮捐献给解放军。战士们一天能吃上三餐饱饭，干革命的劲头就更足了。

回忆当年鄂南剿匪的情景，我深深懂得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道理。

（金口中学汪世喜整理）

建国初期武昌县土改 及其复查的情况

金 锋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同年8月21日政务院公布“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于是一个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国新解放区展开了。

武昌县委根据中央颁布的“土地法”，于7月初部署了土改工作，并组织了以马毅、李仲伯、王克天、曹荷光、王秀生等14位同志为成员的武昌县土改委员会。

1950年11月1日，县委选五里界区唐涂乡为县土改试点。选点依据是该乡秋征任务超过五千斤，群众基础好，土地比较集中，具有典型性。参加试点的工作队共19人（中南局2人，省委4人，县直机关5人，区干8人）由县委宣传部长曹荷光任队长，区委书记张连启同志任副队长，队员有县农会副主席冯庆元、县文教科科长翊端芝等同志。湖北省委刘西尧秘书长亲临指导。同时还确定五里界、梅林、大李三个乡为土改附点。工作队于11月4日进乡，到1951年2月25日土改试点结束，历时80余天。

开始，曾一度发生和平土改偏向，经省委指出，县委及时纠正，决定将“十大阎王”中最凶恶的夏志超、熊德仁逮捕，通过充分发动群众，启发诉苦，在四甲夏斗争了不法地主夏耀氏和熊张氏，在棉花湾斗争了不法地主夏昌全。经省委批准，12月13日在五里界镇举行联合斗争大会，大会组织了以县长李仲伯为首的临时人民法庭。会上有52人控诉了夏志超、熊德仁、付泽民等

互相勾结、抓丁派款、诬陷好人、逼死人命的滔天罪行。台上苦主控诉，台下群众愤怒高呼：“报仇，报仇！枪杀也不能解恨！”控诉完毕，法庭当场宣判夏志超、熊德仁、付泽民三人死刑，立即执行。通过斗争大会，农民进一步认清了地主阶级的罪恶，斗争情绪更加高涨，地主威风扫地，成了过街老鼠。

紧接着于1950年12月6日到22日，历时16天，县委在中原大学召开了县、区干部大会，贯彻省委提出的“如何开展一个大放手、有组织、有领导、有规模、有秩序、轰轰烈烈、翻天覆地的群众运动，彻底消灭地主阶级，为胜利完成土改任务而奋斗。”的意见。省委副书记刘建勋同志到会作题为“开展一个有领导、大规模、轰轰烈烈、翻天覆地、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的报告，指出土改是消灭封建的最后一关，必须抓好；省委秘书长刘西尧同志作了“如何发动群众，认真搞好土改”的报告；县委总结五里界区唐涂乡土改试点工作，指出前一段对地主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对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的指导思想不明确，因此，产生了和平分田的倾向。

会议具体布置了县、区土改工作，决定以纸坊区、五里界区作为县土改的重点，各区由区委书记亲自领导搞一个重点乡，由其他区委参加领导搞一至两个附点乡。明确要求，1951年元月初开始，务必在2月中旬（春节前）突破。

元月初，县委组织了以马毅为首的108人土改工作队（县直11人、区干33人、中原大学文艺学院师生64人）到纸坊区山湖乡开展土改。各区重点和附点乡也同时展开。

全县第一批土改乡54个，从1950年11月开始工作至1951年5月结束。随着土改工作在全县展开，经过两个春秋的战斗，全县土地改革的伟大任务于1953年全部结束。

在土地改革的运动中，工作队认真执行了党的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和

发展农业生产的正确路线；广泛宣传土改政策，发动群众开展阶级斗争，划定成分，分配果实；组织人民法庭审理破坏土地改革的案件，依法制裁不法地主及其他违法分子。

据全县176个乡统计，在土地改革中共没收地主和征收富农的土地197851亩，没收地主耕牛3082头、五大农具（犁、耙、耢、水车、宰碾）13514件、房屋15480间、粮食9906194斤、衣服206418件、家具17万件。广大贫雇农以及中农按土改政策“填坑补缺、按需要”的原则，都不同程度的分得了斗争果实。从土地来看，土改前，贫农人平1.8亩，土改后人平5.8亩；地主由过去人平20亩，土改后为3.6亩，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几千年梦想的土地又回到了自己手中，永远不再过那种逃荒、讨饭、卖儿卖女、家破人亡的苦日子了。

伟大的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不能翻身得解放，从而更加热爱新社会，仇恨旧社会。当党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参军参战，保卫胜利果实时，广大贫雇农和中农立即积极响应，全县有2178名青年报名参加了志愿兵，奔赴朝鲜前线。

土改后，接着是土改复查运动。按照湖北省委指示要求，“发动未发动的群众，打倒未打倒的地主，消灭夹生，完满贯彻政策，稳定新的生产关系，建设好乡政权，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颁发土地证。”从1951年5月起，县委先后在五里界的中洲乡、纸坊区的丁字乡、金口区的三合乡、豹潭区的春和乡、流芳区的九夫乡进行了土改复查工作。由于种种原因，效果不显著。

1952年7月，以马毅同志为首，组成有中南局、省委、县委、区委参加的土改复查工作队，于7月23日到豹潭区隆城乡复查。通过反复宣传政策、调查摸底、召开小型贫下中农座谈会和农代会，检查土改后地主服不服，是否还有漏划、错划的地主；组织纯不纯，贫雇农是否当家做了主人；清算是否彻底。斗争果实分

得公平不公平，农民是否彻底翻了身，生产是否发展了等等。群众反映是：土改时地主阶级没有彻底打倒，并有漏划的，如吴子寿湾一户地主就划为贫农，背后掌权，还分得了头等果实；经常小恩小惠拉拢干部，威胁群众；在清算经济中，全乡35户地主，不彻底的有12户，未清算的12户，拖欠果实的11户；分配果实是按物作价，然后按价值分配；尚有部分房屋、荒山、稻场未分完。于是，工作队进一步发动群众，按土改政策彻底解决以上问题。在阶级成分上，全乡636户，贫农由354户增到387户，占总户数的61%；中农由192户降为189户，占25%；富农由16户降为15户，占2.5%；地主由35户升到45户。通过斗争不法地主，清算果实279720斤稻谷，占该乡土改果实45%。没收地主土地112亩、房屋44间、粮食34400斤、衣服790件、家具2185件、耕牛3头、农具48件。这些没收的土地、物品、粮食、房屋按“填坑补缺”办法分给贫雇农以及中农。撤换不称职乡干部2人。通过建党建团选举干部、整顿民兵组织，进一步巩固了乡政权。焚烧旧契约，颁发土地证、房屋证。9月15日召开庆祝大会，宣告该乡土改胜利结束。

根据隆城乡复查经验，于1952年11月至1953年6月，在全县进行了土改复查。

土改以后，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生产情绪十分高涨，但由于刚刚翻身，生产资料不足，经济基础薄弱，加上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限制，在生产中遇到的很多困难仍然无力解决。为了使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县委积极领导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成立互助组。据统计1950年全县临时互助组为7个，参加农户43户；1951年为17个，96户；1952年为37个，217户；1953年发展到3177个，21777户，占全县农户34.8%。全县办得好的互助组有纸坊区龚家桥乡的林宝清组、豹潭区春和乡的罗华启组、联络乡的汤万贵组、五里界区绵绣乡的曹华清组、山坡区柯雷乡的涂世勇

组等。后来,又以这7个先进组为基础,试办了7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农户有111户,占总农户0.17%,为全县推行农业合作化开辟了道路。1953年,全县粮食总产为26009万斤,比1952年增长15.88%,充分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